

法国



德日进集

20世纪

外国文化名人
书库

上海远东出版社

德 日 进 集

王海燕 编选

上海远东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日进集/(法)德日进著;王海燕编选.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9. 12

(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林贤治主编)

ISBN 7-80613-842-0

Z456.5

1

I. 德… II. ①德 ②王… III. ①德日进-哲学
理论-文集 ②哲学理论-法国-现代-文集 IV. B565.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3587 号

Copyright © Editions du Seuil, 1956, 1957, 1959,

1962, 1963, 1965, 1969, 1973, 1976

本书由法国 EDITIONS DU SEUIL 授权上海远东出版社
独家出版。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德日进集

ER SHI SHI JI

WAI GUO WEN HUA MING REN SHU KU

王海燕 编选

出版 上海远东出版社

开本 850×1168 1/32

(上海冠生园路 393 号 邮编 200233) 印张 13.25

发行 上海远东出版社

千字 347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插页 4

排版 上海希望电脑排印中心

版次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订 上海长阳印刷厂

印次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

ISBN 7-80613-842-0/C·34 图字:09-1999-252 号 定价: 20.00 元

德日進神父是我最
敬愛的老師之一。

賈兰坡

時年九十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20 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 总 序

季羨林

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在永恒不断流逝的时间的长河中，到了一定的时候，应该回头看一看，看看走过的历程中自己走得是否都完全正确，正确的要坚持，不正确的要扬弃。这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古人在这方面有许许多多的教导，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是“前车覆，后车戒”，通常作“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两句话表面讲的仅仅是反面的经验，也就是教训。但是其中隐含着“前车不覆”也是“后车之鉴”的正面的经验。

所谓“一定的时候”，可能短到只指一天，而长则是无限制的，一般的是一年，十年，百年。如果制订几年计划，则在计划结束后，也必须回头看一看，算一下总帐，目的都在回顾前车之覆或不覆以决定后车如何走法。

当前，我们中国的国家和人民，以及全世界的国家和人民，都正处在一个新的“世纪末”中；再想得远一点，是处在一个新的“千纪末”中。这是一个非常的关键时刻。我在很多地方都讲到过，世纪或千纪都是人们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没有什么先天的必然性或必要性。试想：如果没有耶稣和耶稣教，哪里来的什么“世纪”和“千纪”。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则是：既然人们制造出来了“世纪”和“千纪”，它们就起了作用，而且正在起着作用。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

世纪末和千纪末，现在都不是第一次。然而全国和全世界都承认，眼前的这个世纪末和千纪末同过去的都不一样。由于

科学技术的惊人的进步,特别是交通通讯工具方面的突飞猛进,用一些人使用的形象的说法: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了,产生“蝴蝶效应”等等的理论,决不是偶然的。已覆的前车历历可数。当前世界各国政府和一些有识之士高呼“环保”,其声震天动地。这决不是没有根据的,这也让我们这些忧天的杞人感到点安慰。然而,就我个人浅见所及,高呼“环保”而不从事实的发展中,特别是从思想的高度和哲学的高度上,来探索环境之所以必须保护,环保工作之所以是火烧眉毛的紧迫工作的根本原因,这有点舍本逐末的意味,实在为愚陋如不佞者所难以理解。

总之,我们眼前所处的世纪末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纪末。

我在本文一开头就谈到,到了一定的时候,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就应该回头看一看,看一看在过去一段行程中车行和车覆的经验和教训,以决定今后的走法。现在正是这样的的时候了。而且,我认为,应该回头看的不仅仅是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而是整个世界。

正在这样关系到人类前途的关键时刻,上海远东出版社不惜人力物力,编辑出版了一套“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实在是顺乎潮流,应乎人心的壮举,我想,谁也不会吝惜对此举的赞誉。出版社提出的方针,虽然重点是放在人文精神上;然而,大家都会理解,人文精神是指导人类社会前进的关键精神,它是龙头,它同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抓住人文精神这一条纲,则纲举而目张,提要而勾玄。这实在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打算。

为什么单单举出“外国文化名人”呢?中国《诗经》上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富有哲理而又明了形象的话,千百年来,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广为流传,几乎家喻户晓。远东出版社之所以选外国名人,我想其故就在这里。

对于入选的这几十位“名人”中的某一些人,中国学术界肯定会有不同的意见。这是很自然的事,不足为怪,不这样才是怪事。但是,我相信,对绝大多数的入选者来说,大家都会同意的。这些名人,时代有先后,治学有专精,影响有大小,造诣有高低。

但是,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过去一个世纪世界人文精神的发展,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常讲,对世界上万事万物都要一分为二。对这些“名人”,当然也不能例外。我们一定要分清他们思想中的精华与糟粕,以便决定我们的去取。这话实际上已成为老生常谈,不用我说,大家也会明白的。

但是,我们拿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分清精华与糟粕,来决定我们的去取呢?精华与糟粕,说起来明白如日月经天;但实则是泾渭并不分明,而且随时代的推移,有时候还会转化,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我个人的想法是: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以我为主”,不能喧宾夺主;以我们目前的需要为主,决不能陈义过高或过低,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或者甚至幻想。那样是有害无益的。

我们目前的需要是什么呢?我们是一个有 12 亿人口的大国,目前正在进行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件空前伟大的工作。直接的借鉴,中国没有,外国也不会有。但是,间接的借鉴,就算是“前车之覆”吧,则是能够找到的。我说的“以我为主”,就是指以我国当前的实际为主。外国名人的思想中,对这个当前的实际有用的,我们则吸收之,否则则扬弃之。这是天经地义,用不着探讨与辩论。

但是,非常遗憾——至少我这个喜爱忧天的杞人觉得遗憾——,我发现我们学术界少数人有一种不正之风,“不正”二字加起来就成为“歪”字,说不好听一点就是“歪风”,还需要再加上两个字“邪气”,才算完整。他们膜拜外国“名人”,或者并非“名人”,或者在成为名人之前已经销声匿迹的“预备名人”,拜倒在这些人的脚下,战栗兢兢。一听到中国人有什么新的理论,就笑得连鼻子都想笑歪,鄙夷之态可掬。用“崇洋媚外”这个词儿,有点刺耳,就改用一个比较文雅一点的“贾桂思想”吧。在这些人眼中,只有外国人才有资格,才有能力,才有天才,才有权利来创建新理论。在国际学坛上,中国只能成为一个“无声的中国”。对于这种现象,我实在觉得悲哀而又凄凉,可叹而又吃惊。

我对眼前外国的各种学科的新理论要说知道得很多,那不

是事实,而是吹牛。要说我一点都不知道,那也不是事实,而是撒谎。我对这些新理论了解一个大概起。有些新理论,就像时装一样,“蟋蟀不知春秋”。我曾套用赵翼的两句诗:“江山年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十天”。说明我对这些风起云涌转瞬又风吹云散的所谓理论的看法。对待这些新理论,我的态度是:我们必须学习,必须弄通,然后实事求是地予以公允的评价。拒而不学,决不应该;顶礼膜拜,大可不必。后者不应该是一个学人,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学人应有的态度。眼前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彻底扬弃“贾桂思想”,还我一个堂堂正正身。

现在,这一套“书库”已经整整齐齐地摆在我们眼前了。外国的原作者都可以算是“名人”。书中包含着他们的智慧,当然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经验与教训共处。我们应当怎样对待这一套书呢?我个人认为,我在上面刺刺不休地讲的那一些话,就是我们对待这一个书库的准则。首先,书中必有“前车之鉴”,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去识别和利用。其次,这一些书都是“他山之石”,我们用它来“攻”我们的“玉”。第三,“以我为主”,以我们当前的需要为主,这一点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我们要按照我们当前的需要,来细致鉴别书中的精华与糟粕,以决定吸收或者扬弃,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这一点是含糊不得的。如果某一些富于“贾桂思想”的人士,在膜拜当今外国那一批风云变幻,乍起又落的“名人”、“准名人”或“候补名人”之余,又来膜拜这一批已经成为“名人”的大菩萨,则我期期以为不可。是为序。

1997年8月12日,北京

林贤治

此际,我们即将到达 20 世纪的入海口。

整个当代科学,与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结构以及人们

的联系方式、生活方式、斗争方式等等,有着密切的关联。尤其是政治,影响更为直接。与此同时,科学也以其内在的动力,给予社会以影响,甚至充当变革的先导。作为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的科学文化的产物,现代医学、无线电、汽油发动机、相对论、大规模生产的现代化形式,对社会的影响是至深且巨的,20年代量子力学的新生,尤其突出地显示了科学的现代性。50至60年代,核子物理和原子能的应用;60至70年代的自动化和控制论;70至90年代,计算机、微电子技术、人工智能的应用和推广,所形成的冲击力更是前所未有的了。总之,愈到了后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便愈加迅猛。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也同样发生了许多富有时代特点的变化。各种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不断出现;裂变,渗透,整合同时进行,互补性原理成了背后的强有力的支架。整个当代科学,处于高度综合又高度分化的趋向之中。习惯性思维,正统的观念意识,现成的定律及范式之类,遭到进一步的怀疑和挑战:绝对权威不复存在。封闭是愚蠢的。个体性,差异性,偶然性不容忽视。没有万古长存的事物,因此变革不能停顿。打破现存的秩序,从无序到有序。统一并非操纵,它仅只意味着事物间的某种关联。既有控制,必有反控制,如此才构成了“系统”……普利高津在描述最近20多年来自然观发生整体的断裂时,指出:这种断裂绝不可能是某一单独领域造成的结果,而是广泛的现象,产生时带有爆裂声,并且可以扩展。爆裂的声音虽或遥远,微末,隐约有闻;然而它是切实的,所以能够鼓舞心灵,使我们感知未来的震荡。

自从罗马俱乐部的报告问世以后,人口问题,粮食问题,能源问题,环境保护及生态平衡问题,还有海洋及空间问题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未来学界,各种极端的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论调都出来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已被告知:科学本身潜在着使徒和魔鬼两种力量,而且一直处于冲突之中。当科学技术走向成熟,或者说,当它从掌握自然力量进而左右人类生活时,文明危机便随之发生了。

所谓文明危机,其实是意义危机,价值危机。因此,如何从

事文化主体的精神品格的建设,是横亘在我们与时代之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知识分子是科学文化的发掘者和播种者,是精神文化的体现者和改造者;但同时,又是社会危机和历史责任的一大承担者。

古代的人文学者曾为贵族和教会写作,自然科学家为雇主工作,直至 15 世纪,科学和艺术仍然沦为神学的婢女,我们很难从中窥见人文精神的闪烁的微光。欧洲文艺复兴以后,情况渐渐有了改变。经验科学正步进入信仰的地盘,驱赶其间的迷雾,理性之光使认识升华;虽然后来有着对“非理性”的阐扬,而其实,那是对无视人类更广大的精神领域的专断与僭妄的理性的抗议罢了,结果维护了人性的健全。自近代以降,科学文化不断获取“新工具”,但最重要的莫过于寻找灵魂。知识分子以其创造性劳动服务于人类,在体现自身价值的同时,表达了对社会的关怀。由于知识分子的理性自省能力的增长,人文思想的血脉非但不会中断,二战以后,特别在今天,对于人类,人的本质,人的命运以及未来的关切,几乎成为知识界压倒一切的主题。

今天,我们着手编辑“20 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本意在于通过个人选集的组合方式,显示接连几代知识分子的基本风貌,勾勒出本世纪人文思想发展的大致轮廓。这是初步的素描,尚谈不上严整的巨幅壁画。

前人有“万有文库”,万物皆备于我,可谓懿欤盛哉;但以我们的能力和条件,大抵只好择取一组组断面了。自然,不求完备也未尝不可以算是一种选择。外国近代思想的译介,已经有一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了,可是,多少经典性作家,至今没有他们的译本,甚至连名字也鲜为人知。对于一个文化大国来说,这是很不相称的。庞德说,伟大的文学世纪必然是翻译世纪。广而言之,文化也一样。有鉴于此,当我们做着世纪性的文化总结时,就决意把国内的部分割让出去了。剩下的工作,也就是手头要

做的工作,用鲁迅的话来说,还是叫“盗天火”罢。

作为这样一套大型丛书,本当不限于文化积累的;最根本的目的,仍在于现代文化的重建。当此全球信息一体化的时代,民族文化的发展,必然以世界文化为背景;我们唯有汲取异质性的思想观念,文化知识,人文素养,才能从一个先天的传统的体系内部,创造出有利于保存、发展和完善我们自己的良好的生态环境。

这部“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在上海出版,使我们深怀一种温暖,遥遥缅想那里的创榛辟莽、筚路蓝缕的一代翻译界先驱。在中国现代化的启蒙时期,他们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全国的译书中心——所凝聚,口述笔译,中外参证,推敲译名,另铸新词,掀起了西学东渐史的第一页。

有一部日本思想家撰写的著作《20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于1901年在我国翻译出版。出版后,即遭政府当局查禁。1927年,曹聚仁先生将它重新标点出版,赞叹道:“在25年前,中国学术界已有人来译述这一类读物,真可使我们现在人十分惭愧。”比起时代要求于我们的,我们着实做得太慢了,太少了。

在又一个世纪的钟声即将鸣响的前夕,谨以此书库为人类思想文化生生不息的洪流作涓滴奉献。

1996年7月,广州

序

刘东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形成了一个东西文化交流的高潮。这是本世纪以来第二次比较活跃的东西学术文化交流。第一次是从五四运动前就已经开始的,继五四之后,兴盛于二三十年代。在那一次交流中,有许多国际知名的西方学者来华进行讲学、考察和长期的合作研究。他们对东西方的交流和民间友谊作出了贡献。

法国天主教神父,巴黎科学院院士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就是其中的一位。自1923年他到天津和桑志华(Ernie Licent)神父共同创建由北疆博物馆(现名天津自然博物馆)与巴黎博物馆联合组成的“桑志华—德日进法国古生物考察团”起,直到1946年他最后一次离开中国,为时23年之久。其间他虽然曾几次回国和到其他地方做考察工作,但在中国度过了大部分的岁月。离开中国以后,他深深地怀念中国,在逝世前几年曾给协和医院新生代研究室主任、古生物学家杨锺健先生来信表示想再来中国。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是值得纪念的。

在中国地质和古生物学界,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杰出的地质学家和古脊椎动物学家,但几乎没有一个人谈到他还是一位哲学家和思想家,甚至连与他合作很久的杨锺健先生以及后来在协和医院新生代研究室工作的裴文中先生和贾兰坡先生等也很少谈及这一方面。这可能是因为他治学严谨,不愿在纯科学

工作之外谈及其他,或许还因为他的一些重要哲学思想形成于 1937 年以后,并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五六十年代,裴文中先生注意到了“德日进学”在法国科学界和哲学界的影响。不久,德日进的哲学思想在国际上也引起了重视。1981 年,在纪念德日进诞辰 100 周年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周明镇和李彦贤两位先生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国际研讨会。直到这时我们才对德日进作为一位哲学思想家的学说略有所知。但是限于某些客观条件,我们对于他的哲学著作仍然知道得很少。他的 20 多卷的文集中有一半是自然科学,一半是关于哲学和神学的。在我国,读过他的书的人不多。有的人知道德日进的名字还是通过英美人写的文章。大家都很想知道德日进哲学思想的具体内容,但国内译文也很少。最近王海燕同志等把德日进哲学方面的一些重要著作翻译出来,为我们了解德日进的哲学思想提供了资料,这是一件好事,我们应当对他们所作的努力表示感谢。

德日进是一位成绩卓著的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学家。作为一位古生物学家,他是完美地结束了一个时代的代表。但是,在哲学思想领域,他则是一个勇敢地开辟新境界的人物。

德日进在中国从事地质和古生物学工作近 20 年,对中国第四纪地质新构造运动,对中国的花岗岩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古哺乳动物和古人类的研究,提出过精辟的见解,作出过富有意义的贡献。他在古生物学方面不愧是一位权威。

德日进一生以古脊椎动物的演化为其研究的主题。在纯粹古脊椎动物学研究中,他似乎意识到了古典的古脊椎动物学研究的时代特征。杨锺健先生曾说过:“德日进曾想把古哺乳动物所有门类都研究一番,并且为每一种都写一本古生物志。”我想这句话不仅代表了德日进当时的心态,而且也代表了古脊椎动物学界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共识。德日进在中国的工作,像那个时代的最好的专家一样,对所研究的问题详尽地占有材料,精细地观察和描述,简洁扼要地归纳和总结。他的这些研究对于后来者是一种宝贵财富。

对于他的哲学思想,我是一个门外汉,无法深入。我们从他在古生物和古人类学研究所透露出的一点信息知道,他在40年代所提出的哲学上的见解正在逐步显露其意义。他关于“智慧圈”的论述,他在《人之现象》中提出的人类共同的问题,都是他的思想的精华,但在当时和者甚寡。在他逝世以后,才开始有人认为,他的思想对于未来的时代可能是一个先驱。即使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我也感到德日进著作中译本的出版对于当代东西方学术思想的交流是一项重要的贡献。

编者前言

王海燕

在 20 世纪的西方思想家中,德日进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一方面,他从小受到正规的神学教育,后来成为天主教中以严格闻名的耶稣会神父;另一方面,他又毕生从事古生物研究,并入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而且,他在中国度过了漫长的 23 年,为中国的古生物学创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德日进虽非职业作家,但却是 20 世纪西方国家乃至世界很有影响的文人。他的文稿 30 年代起被一些人传抄,五六十年代发表后被译成 10 多种文字,引起的“热”持续了 10 年之久,被称为“德日进现象”。1965 年和 1981 年德日进逝世 10 周年和诞辰 100 周年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两次召开国际研讨会,纪念这位有世界影响的科学家和思想家。

德日进的著作之所以引起人们注意,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他触及了本世纪西方社会的一个深层问题——信仰问题。德日进的思想形成于 20 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正是西方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时期,各种矛盾交替出现,现代科学技术不断令人兴奋的发现和创新使得人们不再期待传统的“救世主”和“天堂”;而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态环境失衡、资源消耗过快、贫富差距拉大以及失业等一系列问题,又使得人们对科学技术寄予的巨大期望冷落下来。人类社会在进步还是在退化?前途是什么?人类是否将会自我毁灭?生命的意义何在?德日进本人是天主教耶稣会教士,是神父,同时又是一位世界知名的地质

和古生物学家。他试图在理性与信仰之间进行调和。作为一名神父,他不唯教条是从,而是大胆地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融入宗教思想,为此,他受到耶稣会保守人士的斥责,并被驱逐到中国,著作在生前受到禁止。但同时,他也反对唯科学主义,认为物质文明的进步不能代替宗教信仰。德日进的宇宙观在西方那些有文化素养的人士中的影响是很深的。我国已故著名学者、诗人盛成教授认为,不研究德日进就不能真正理解现代西方社会。

德日进一生坎坷且具传奇色彩。他逝世后世界各地发表的回忆文章不计其数,而且都满怀激情。凡是见过这位高个子、高鼻梁、目光似乎总是看着很远的地方、深邃严谨而又很随和风趣的学者的人,都对他留有不同寻常的记忆。由此可以看出,德日进除其思想的魅力外还具有相当大的人格魅力。

1881年5月1日,德日进出生在法国中部奥维涅省的一座小城堡中。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对德日进影响很大。他被送进一所教会办的学校就读,成绩一直很优秀,18岁便进了耶稣会初修院。30岁被正式授予神甫品。因此,德日进对上帝的信仰最初来自于家庭和学校教育。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关于物种起源的研究和生物进化的思想开始被人们认识,并引起强烈反响。科学技术及工业化的巨大成就和进步使西方社会历史上一直占有首要地位的宗教信仰受到自文艺复兴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青少年时期的德日进很早就对石头感兴趣,对已化为岩石的动植物感兴趣,对岩石中沉积的自然变迁感兴趣。他要在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世界中寻找他内心追求的绝对和永恒,生物进化思想引起了他的共鸣。对于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对立,德日进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既不满意当时教会说教中对世界的某些解说及其对科学研究活动的蔑视态度,也不赞同完全否定宗教的意义。可以说德日进以后的全部写作几乎都是试图把他内心对宇宙大统一的视服用既符合真正的宗教精神又能被现代人的理性所理解的语言表达出来。